

# “平等”比“自由”更重要

## ——作为思想史文本的《伤逝》

王小惠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从清末“罗兰夫人热”到五四“娜拉热”可知, 清末以来的女性启蒙思想进入“‘自由’压抑‘平等’”的思维之中。鲁迅《伤逝》延续清末何震关于男女平等的思考, 批判清末以来“‘自由’遮蔽‘平等’”的现象, 反对将“性别权力问题”转化为“新旧等级问题”的启蒙思路。而且鲁迅在《伤逝》中对男女间“温习旧课”的思考, 否定了“五四”时以强者为中心的爱情自由变迁观, 反思“‘自由’压抑‘平等’”思维所带来的现实破坏性。同时《伤逝》凸显“家务平等”在自由爱情、婚姻中的重要性, 提出日常家务的性别属性并非女性专属, 强调“家务平等”与“经济平等”“精神平等”同等重要。总之, 作为思想史文本的《伤逝》是近现代女性主义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关键词:** 自由; 平等; 爱情变迁; 家务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5-0196-11

《伤逝》是鲁迅作品里较为难解的一篇, 其意义“不大看得明白”<sup>[1](179)</sup>。目前诸多研究者对《伤逝》进行解读, 或指出子君与涓生的结局投射出鲁迅对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的思考<sup>①</sup>; 或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认为涓生是“男权主义者”“虚伪的忏悔者”“隐含作者的反讽对象”, 而视子君为“可怜的弱者”“始乱终弃的受害者”“后退的新女性”<sup>②</sup>; 或从文学索隐上考证《伤逝》是鲁迅自己感情或兄弟失和的展示<sup>③</sup>。这些研究丰富了《伤逝》的内蕴, 可仍留下被诠释的空间: 一是多站在“五四”语境中理解《伤逝》, 忽略鲁迅对清末女性主义问题的回应与延续; 二是多分析《伤逝》对男女间经济、精神问题的思考, 忽视鲁迅对男女间家务问题的反思; 三是较少关注《伤逝》对“平等”与“自由”间关系的思索, 未重点展示“平等”高于“自由”的女性解放主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立足清末至“五四”的历史语境来认识《伤逝》在现代思想中的价值。

## 一、从罗兰夫人到娜拉: “自由”对“平等”的遮蔽

在《伤逝》中,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是“五四”自由话语之产物。在“谈家庭专制, 谈打破旧习惯, 谈男女平等”<sup>[2](114)</sup>的启蒙下, 子君毅然离家出走, 并“分明地, 坚决地, 沉静地”说出: “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sup>[2](115)</sup>这是“五四”娜拉对“自由”振聋发聩式的呼喊, 反对“他们”对“我”的压抑, 否定传统礼教与家族观念对人的束缚, 期盼“我”的绝端自由。“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虽是“五四”时娜拉们集体性的呐喊, 却是自清末以来层垒造成

收稿日期: 2024-03-10; 修回日期: 2024-0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章门弟子’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关系研究”(21BZW127)

作者简介: 王小惠, 女, 四川通江人,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联系邮箱: xiaoyanjing1985@163.com

的女性对“自由”的宣言，为清末罗兰夫人形象“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精神的时代延续。梁启超在1902年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中写道：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sup>[3]</sup>

至此，“自由，自由，生死将汝以求”<sup>[4]</sup>成了清末进步女性的口头禅。这些女性追随罗兰夫人的“不自由毋宁死”，提出“吾梦见罗兰夫人，教我自由之道”<sup>④</sup>。在罗兰夫人精神的引导下，“自由”是女性解放的首要条件，使得“生撒自由花，死成自由神”<sup>[4]</sup>“锄得阶前干净土，满园遍种自由花”<sup>[5]</sup>成为清末鼓励女性解放文章中的思想主题。可清末女性对“自由”的追求，多以“恋爱自由”的实现来完成的，因为“父母专命，媒妁甘言，以公理论，既为剥夺我女界之自由权，则结婚非自由不可”<sup>⑤</sup>。清末小说也多视“恋爱自由”为女性解放的基础，如小说《自由结婚》倡导：“天下有哪一事不要自由？为何许多男女都放着别的自由不管，独独于这嫁娶自由死命不肯舍呢？岂不是因为结婚为男女一生大事，结婚失了自由，就要终身受累吗？”<sup>[6]</sup>

在《伤逝》中，作为“五四”娜拉的子君延续了清末罗兰夫人式的自由观，将“自由”视为女性解放的最终目的，以“恋爱自由”的成功来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实现。可宣告中“我”代表的是男性与女性所结成的同盟，即《伤逝》中子君与涓生所形成的恋爱共同体。“他们”代表的是传统旧势力与旧道德。而男性带着女性的离家出走，象征着“我”反抗“他们”后所取得的胜利。可男女青年形成合力的“我”，与代表传统势力的“他们”对抗时，却忽略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失衡问题。这种性别的不对等引发了“女性离家出走之后怎样”“女性获得自由之后应该何去何从”等问题。

从清末罗兰夫人至“五四”娜拉，“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宣言，鼓励着许多女性如子君般离家出走。在“子君”们以“我是我自己的”等新理念解构旧传统旧家庭时，何震在清末已发现此种新旧对立结构中的性别不对等现象。在何震看来，用男女恋爱共同体去对抗传统社会，很容易模糊、消弭男女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所以女性解放的根柢应是“平等”，而非“自由”，那么“以婚姻自专，不告于父母，不宣于宾朋，甚至于数载之间，离合之事，已遭再三矣”的现象只是“空言平等”的“野蛮自由”<sup>[7]</sup>。为此她极端地提出：

以初昏之男，配初昏之女。男子于妻死后，亦可再娶，惟必娶再昏之妇；女子于夫死之后，亦可再嫁，惟必嫁再昏之夫。如有以未昏之女嫁再昏之男者，女界共起而诛之。<sup>[8]<sup>43</sup></sup>

当时日本学者幸德秋水认为，何震的观念违背了爱情的自由准则，因为爱情的神圣在于“自由”，不能有“法律”“制度”“习俗”上的束缚，即：“以爱情为男女交际之要件，即可不必问其为法律上所许否。即夫妇相栖而成家，如现时所谓结婚制度者，将来自由之社会，亦不必以此为必要之事。”<sup>[9]</sup>在何震看来，“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这也是她与幸德秋水的分歧所在：

盖幸德君及堺君之意，在于实行人类完全之自由，而震意则在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立说之点，稍有不同。<sup>[10]</sup>

这种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理念，表明“人类完全之自由”是建立在“人类完全之平等”的基础之上。何震对男女间“完全之平等”的强调，看似极端，却有其历史合理性。清末至“五四”流行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中的“我”，虽打破“传统”与“现代”的等级结构，却存在男女间的“内部殖民”关系，这“比阶级的壁垒更为严酷”<sup>[11]</sup>。与“他们”对抗中的“我”看似是男女双方组成的恋爱共同体，实则这个共同体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只是男性反传统的工具而已。因此，不打破男女间的“内部殖民”，女性无法获得真正的解放。按何震的说法，缺乏性别平等的女性解放，“名为解放，实则解放之权属于他人，不过为男子所利用而终为其附属物而已”；而那些“不受立法约束”的自由爱情也只是“外托自由平等之名，阴为纵欲肆情之计”<sup>[12]</sup>。

清末以来,何震对“自由”“平等”的思考,并未得到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视。随着“罗兰夫人”与“娜拉”成为大多数女性追求自由的偶像,女性运动中的“平等”逐步地被“自由”所遮蔽。尤其到“五四”时,从《娜拉》的进入与“易卜生主义”的传播,到以《终身大事》为代表的“娜拉型”话剧或小说的大量涌现,对恋爱自由的歌颂已成女性运动中的“最强音”。当时青年男女视“人是必须为恋爱而生存的”<sup>[13]</sup>,认为“宇宙间除了真诚的恋爱之外,什么都是虚幻的”<sup>[14]</sup>。至此,恋爱问题成为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与终极目标,而其他如参政、职业、教育等问题不过是达到恋爱自由的手段而已,形成“以恋爱解决妇女问题”的思维:“要谋妇女的自由,必先提倡恋爱的自由;教育经济政治道德的解放,无非是谋恋爱自由的手段,恋爱真正自由了,妇女问题也便解决”<sup>[15]</sup>。

在“百事不管,惟知恋爱”<sup>[16](69)</sup>的语境下,鲁迅用《伤逝》重提何震清末所警惕的“‘自由’压抑‘平等’”的现象。《伤逝》中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鲇鱼须的老东西”“局长”“子君的胞叔”“子君的父亲”等是旧传统的代言者,他们的叙事功能强化了子君与涓生所组成男女共同体的“新”,而子君的出走,表明“新”的胜利。可当“新”(我)胜于“旧”(他们)之后,子君仍旧回归到男主女从的性别秩序之中,从经济与精神上皆依附于涓生,从事着传统家庭妇女的工作。在男主女从的性别秩序中,子君并未获得任何真正的“自由”,她所呐喊的“我是我自己的”,并非自我觉醒之呼声,而是将男性对自由的想象(反传统、反家庭专制)整合到自我结构之中。当二人面对经济危机时,涓生像杀掉油鸡,抛弃阿随一样地处理子君。这表明缺乏性别平等的“自由”,只是一种装饰性的“外观”,无法给女性带来真正的保障。

在《伤逝》中,同居后的涓生不断提醒子君:一是“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sup>[2](124)</sup>;二是“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sup>[2](118)</sup>。这虽是涓生的自辩,却是鲁迅对当时以爱情来实现“自由”的女性的提醒。在鲁迅看来,要实现真正的自由爱情:女性既要有“经济权”,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又要拥有独立的人格,能在精神上与对方共同发展。而要实现女性的“经济权”与人格独立,必须打破男女性别中的权力结构,实现男女在经济、教育、文化、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当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权力时,女性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恋爱问题”并非妇女解放的先决问题,而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结果。如果本末倒置,让恋爱问题成为实现女性解放的手段,容易使女性从对“父亲”的依赖转移到对“丈夫”的依附。

鲁迅借由《伤逝》反思了清末至“五四”女性运动中“‘自由’压抑‘平等’”的现象,表明“平等”应为女性解放的首要目标。在鲁迅看来,要彻底打破男女之间的主奴结构,“钱是要紧的”<sup>[17](167)</sup>,因为“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女性的叹息与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而在男女不对等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所有的好名目“都是空话”<sup>[18](615)</sup>。这一点与何震所思极为一致。何震认为,“如欲实行女界革命,必自经济革命始”,因为“女界革命,必与经济革命相表里。若经济革命,不克奏功,而徒欲昌言男女革命,可谓不揣其本矣”<sup>[19]</sup>。

何震与鲁迅都强调女性运动中“平等”的重要性,可二人的男女平等观存在一定的差异。何震认为,“男性”“女性”并非天然形成的,而是后天“习惯使然,教育使然”,那么“‘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此诚所谓‘男女平等’”<sup>[8](43)</sup>。为此何震提出上文所讲的“以初昏之男,配初昏之女”等绝对的男女平等主张。而鲁迅则指出,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是有差别的,所以男女平等绝非“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而是应该尊重性别差异,使得男女“地位同等”,因为“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sup>[18](615)</sup>。用比喻来讲,

男女的所需各有差异，“要吃一碗饭的给他一碗，要吃二碗的给他二碗，便是真平等，初不必定要只能吃一碗者非照样给他二碗不可”<sup>[20]</sup>。鲁迅的平等观是“要吃一碗饭的给他一碗，要吃二碗的给他二碗”，而何震坚持“只能吃一碗者非照样给他二碗不可”的男女绝对平等，其结果会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

由上可知，鲁迅《伤逝》延续了清末何震的思考，表明在女性解放运动中“平等”比“自由”更为重要。清末至“五四”，“罗兰夫人”与“娜拉”的被歌颂，使注重批判家族专制的个人自由主义话语遮蔽了性别权力关系。虽然有何震与鲁迅的提醒，但是“五四”以来的时代主流依然进入“‘自由’压抑‘平等’”的恋爱潮流中，把性别权力问题置换为新旧等级问题。甚至一些后世研究者在解读《伤逝》时仍用“新旧问题”掩盖“性别问题”，认为“从涓生心的离去到身的离去，涓生以婚姻的破碎维护了现代婚姻的自由，这是他的认识高于子君的地方。”<sup>[21]</sup>此种论述忽略了《伤逝》的深意，依然以男女女从的自由观为标准。

## 二、“温习旧课”：“五四”爱情定则的限度

鲁迅在《伤逝》中不仅延续了清末何震的思考，从思想理论层面批判“‘平等’被‘自由’压抑”的倾向，而且他还从实践层面反思了此倾向带来的现实破坏性。“五四”以来流行的爱情定则，便是“‘自由’压抑‘平等’”思想所引发的社会文化现象。“五四”以来的男女双方“有恋爱时，hand in hand，无恋爱时，you go your way，we go ours”<sup>[22]</sup>。他们或认为“爱情原与天气是差不多一样的自然现象。天气不能天天一样，爱情自然也难免有时要有转变”<sup>[23](150)</sup>，或强调“无论对于什么人，听我高兴，要恋爱便恋爱，毫无拘束限制的意思”<sup>[24]</sup>，或主张“自由的婚姻，起初固由自然的，自由的恋爱而结合；但是恋爱变化，也是自然的，自由的”<sup>[25]</sup>。在“五四”时期，自由恋爱中的“自由”被解读为“自然”“无拘束”“无强迫”“但凭己意”“无掣肘”“流动”等。此种强调“流动”“无拘束”的爱情观，就是“五四”爱情定则。

在《伤逝》中，涓生躬行“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sup>[2](118)</sup>的爱情定则，他期盼自由爱情能不断地更新与创造，因为爱的“流动”能使“恋爱之花”充满生机。可在同居后，涓生并未感受到“爱”的更新与生长。在他眼里，曾经有着“彻底的思想”的子君，在同居后却甘于“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总是“温习旧课”，让他一遍又一篇地回忆恋爱往事：

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sup>[2](116)</sup>

“温习旧课”的爱情，违背涓生“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的理念，使他极度压抑，“常觉得难于呼吸”<sup>[2](125)</sup>。涓生遵循“五四”爱情定则，反对爱的“凝固”。在同居前，子君的无畏、大胆让涓生感受到“恋爱的花”充满生机与活力：当面对“鲑鱼须的老东西”等周围人的指指点点时，子君“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sup>[2](115)</sup>；在二人“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时，涓生“全身有些瑟缩”，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sup>[2](117)</sup>。在涓生眼里，同居前的子君是勇敢追求自由的新女性，散发着革命性、先锋性、叛逆性的浪漫主义气质，让他“看见辉煌的曙色”<sup>[2](115)</sup>。此时的涓生将子君美化为自由的偶像，视其为自己的拯救者，“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sup>[2](113)</sup>。

按照涓生的期待，离家出走后的子君应比之前更大胆、更无畏。可同居后的子君退回“旧路”，走向“五四”爱情定则的反面：一方面她忙于“吃了筹钱，筹来吃饭”的日常琐事，忙与那小官太太

的暗斗,成了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另一方面她与涓生不再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sup>[2](118)</sup>,在思想上完全顺从于涓生。子君对涓生的顺从,恰恰是涓生最为厌恶的。在涓生眼里,子君已从“自由的个体”变为“依附顺从的家庭主妇”,成了他最讨厌的样子。在涓生看来,他与子君是为“自由”而在一起,可子君违背了他们的爱情,背离了“自由”。所以当涓生清醒地读遍了子君的身体、灵魂后,他隐约地传递出被欺骗的感觉:“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sup>[2](117-118)</sup>

与涓生的结合,是子君的破釜沉舟之举,是她为“自由”所能做到的全部。同居后的子君已孤立无援,她无力再去寻求新的资源来面对涓生对她的诸多要求。尤其预感到涓生对她的厌恶时,她为挽留涓生,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让涓生回忆爱情往事,希望用爱情往事来化解现实中涓生对她的不满。在涓生一遍又一遍地“温习旧课”中,子君重温爱情的美好,那些曾经的美好让她能暂时忘记现实生活中涓生对她的冷淡、嘲讽。可一遍又一遍地“温习旧课”,让涓生感受到“自由理想”的落空。他在文中不满道:“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常觉得难于呼吸。”<sup>[2](125)</sup>子君“温习旧课”般的“凝固性”,使她在“五四”爱情定则中丧失了合理性。那么涓生对她的抛弃,符合“爱情尽了,当然走开”<sup>[23](150)</sup>的原则。

鲁迅借由子君与涓生的故事,对“五四”以来流行的爱情定则进行思考。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刊发的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引发一场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张竞生认为,“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的”,“已订婚的则至解约,成夫妻的或至离婚”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相爱的双方需时刻改善彼此相爱的条件,获得“爱情上时时进化的快感”<sup>[26]</sup>。冯士造也指出,“爱情本有变迁的可能,既已变迁,本可自由离异”<sup>[27]</sup>。丁勒生亦认为,因爱有变迁性,所以“夫妻或未婚夫妻,应互相勉励,提高感情”<sup>[28]</sup>。谭树魁则讽刺“提倡爱情是不变的人”是“恢复旧礼教的‘从一而终’”<sup>[29]</sup>。张竞生等人的观点在当时遭到不少质疑。世良认为“爱情变迁”的原则会导致“今天见好的,爱情变迁了,因而至于爱好的,明天见更好的,爱情变迁了,又去爱更好的”<sup>[30]</sup>的局面。裴锡豫提出“变迁爱情的人”是“趋炎附势”<sup>[31]</sup>。钟孟公1923年6月12日致信《晨报副刊》,提出这些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毫无价值”,应“至期截止,不要再是这样的胡乱尽登下去”<sup>[32]</sup>。

鲁迅却希望“不截止”<sup>[33](435)</sup>,此后便用《伤逝》对“爱情定则讨论”进行回应。鲁迅以子君与涓生的故事展示了爱情应有的“变”与“不变”:一方面爱情本是男女两人在精神上相互渗透而结合的,那么相爱的双方要不断地完善自己,力求进化,使爱情永远地生长下去,否则如子君般一味地“温习旧课”,只会让爱情窒息;另一方面爱情亦有不变迁性,此种不变迁性源自人类的同情与怜悯之情。在性别不对等的社会里,子君为了自由爱情而离家出走,早已一无所有,不再具有变迁的可能。此时涓生强迫其“变迁”,只是将其逼向绝路。因此在鲁迅看来,爱情的变迁是建立在同情、怜悯之上,缺乏同情的爱情变迁观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快意恩仇。

在《伤逝》中,鲁迅肯定涓生有变迁爱情的权力,却又以涓生批判了缺乏悲悯同情的爱情变迁。钱谷融注意到《伤逝》题目的特殊性,指出:“中国人对妻子的悼念习惯上称为‘悼亡’,对朋辈才用‘伤逝’。”<sup>[34]</sup>夫妻之间有责任有义务,是被限制的状态。而朋友之间是完全自由的状态,合则在一起,不合就分离,没有固定的状态。“伤逝”二字暴露了涓生对子君情感的不严肃性,意味着他并不想与子君成家。直白一点,涓生将子君视为自己爱情变迁史里的“中间物”,一旦子君不符合他心中的样子,他会依据“爱情尽了,当然走开”<sup>[23](150)</sup>的原则来审判子君。当子君不断地用“温习旧课”,来挑战涓生的爱情进化论时,二人的危机早已注定。此后的生存危机,只是涓生抛弃子君的契机而已。翻看民国文献,子君与涓生经历的经济危机,是当时大部分青年男女所遭遇的困境。从现实例子来看,

丁玲与胡也频在北平时所经历的生存压迫远甚于子君与涓生。丁玲与胡也频最后走出了困境，可涓生却并未准备同舟共济，反以解除二人关系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因此，涓生看似是用结束恋爱关系的方式来逃脱经济问题，实则是在以经济问题来摆脱爱情上的倦怠。

鲁迅对涓生的谴责，极具历史的针对性。“五四”以来不少男子以恋爱的名义，挖空心思地追求女子，可“一旦到了手，就平淡无奇了。日久生厌，他们又想去采另一朵鲜花，去玩另一件的玩具了”<sup>[35]</sup>。在这些男子的眼里，他们遵循的是爱情变迁的原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可这却导致不少女性的悲剧：1923年新女性梅笑孝追求“真爱无论如何绝不中变的”，却遭遇“真爱不过是一时”的困境，在与某君同居不久，她便被抛弃，最后抑郁而亡<sup>[36]</sup>；1924年新女性黄君“因为实行恋爱结婚，不惜和家庭脱离关系”，可她的恋爱对象在骗取黄君的三千大洋后，将容貌渐衰的黄君抛弃，最终黄君“自怨认人不真，便堕楼以图自尽”<sup>[37]</sup>。对于以上子君式的悲剧，当时不少报刊有所讨论。譬如《妇女杂志》刊登《牺牲者的悲哀》《离婚与弃妻》《一件妥协的离婚》《离婚与男女的经济平等》《离婚之标准：爱情和人道》《离婚的条件》《离婚后的悲哀》等文，期盼建立“不牺牲人道”的自由爱情观<sup>[38]</sup>。虽然如此，但子君式的悲剧依然频频出现，展示出以男性为中心的爱情变迁观所带来的现实破坏性。

子君式的悲剧不仅是社会现象，亦是人性上的现象。近现代以来，“现代”与“传统”处在博弈中。此种博弈，为中国人的精神结构注入诸多现代性元素，让人们敢于反抗传统，敢于追求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但不可忽略的是，“人性之恶”也在借助“现代性”的名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正如“五四”以来“时时更新”的爱情定则，本具备极强的现代性，打破传统礼教对人的束缚，让男女双方都拥有选择感情的权力。但此种现代性理念，一旦无节制地实践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只会走向“现代”的反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霸权”<sup>[39]</sup>，即：以“自由”的名义掩盖了人性中“喜新厌旧”的贪欲、“欺负弱者”的暴力欲等，为“人性之恶”找到了理论上的托辞。在《伤逝》中，涓生不过三星期，就已读遍子君的身体和灵魂——“除了频繁换人，任何子君们的身体和灵魂的更新升级速度，如何能赶得上涓生的阅读速度”<sup>[40]</sup>。“频繁换人”成了涓生们爱情定则的最终结果，而“欺负弱者”“喜新厌旧”等则在“自由”“爱情”等“好名称”的遮盖下而被世人所忽略。

鲁迅对子君式悲剧背后人性现象的批判，展示出其“立人”思想的复杂性。鲁迅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首在立人”，即“人立而后凡事举”<sup>[17](58)</sup>。鲁迅“立人”思想强调“人”的相互主体性状态：一是推崇“人”的主体性，主张“人各有己，不随风波”<sup>[41](27)</sup>。这凸显“人”的自由、独立、个性、叛逆，让“人”从传统儒家伦理导致下的依附性状态中获得解放；二是尊重“他人”的主体性，提出“反诸己”<sup>[41](35)</sup>。这要求不可干涉、吞噬“他人”的主体性，对弱者有同情、怜悯之情，具有人道主义精神。鲁迅的“立人”思想为中国现代人性注入了个性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以建构健全的“人”。但“五四”以来，“人”的个性主义一面不断膨胀，而其中的“人道主义”却被忽略。《伤逝》中的涓生并非鲁迅所定义的健全之“人”，他因人道主义精神的欠缺，其所谓的个性主义最终也成了利己主义。因此，在“个性主义”极度膨胀的1925年，鲁迅用《伤逝》再次提醒，兼有“个性”与“人道”的“人”，才具有真正健全的主体性。

### 三、“雇个女工”：赘语与家务非对等

在近现代思想史中，从清末何震、秋瑾、金天翻等到“五四”胡适、陈独秀等，他们都从宏观的角度关注“经济平等”“精神平等”在女性解放中的作用，但他们却忽略从微观的角度关注“家务平等”在女性独立中的重要性。家务琐事本是男女日常生活的中心，如果家务不平等，男女之间何谈真

正平等。鲁迅的《伤逝》较早从微观的角度涉及“家务平等”的问题。《伤逝》展示女性的“自由”是建立在“平等”的根柢之上。它对男女经济平等、精神平等的凸显，是文本最为明显之处。可在潜文本中鲁迅不断地暗示，就算子君与涓生拥有经济、精神上的平等，但家务问题也会成为二人关系能否继续前行的关键。同居后，家务是子君的工作，而涓生总用“雇个女佣”的赘语来逃避他应尽的家务劳动。二人情感危机大部分源自外界经济的压力，可家务劳动上的不平等深化了他们间的裂缝。

在小说中，涓生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他对于子君的不满：①子君扮演着极为不成功的主妇角色，让“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sup>[2](121)</sup>，没有给“我”提供好的生活环境；②子君“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sup>[2](121)</sup>，变得粗俗，不爱花，将“我”买的花枯死在壁角，无法给予“我”精神上的安慰；③“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她只知买菜做饭，养鸡喂狗，没有时间读书散步，“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sup>[2](121-122)</sup>；④子君长胖了，整日蓬头垢面，从“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sup>[2](113)</sup>的美丽少女变成了“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sup>[2](119)</sup>的邋遢妇人。

这些“不满”展示出涓生与子君对家务认知水平的不同。上文已提及，因经济上的不独立，加之精神上的依附性，子君只能转向家庭琐事。她对家务的认知水平，停留在“爱他就是照顾他”的旧式贤妻状态。可涓生对家务的认知要求却是“爱他就是懂得他，并照顾他”。在涓生眼里，“懂得他”是“照顾他”的前提，其“懂得他”有多重含义：一是懂得他的理想，要陪他散步，谈论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话题；二是懂得他所欣赏的“美”，要会照料花草；三是懂得他的事业，要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为他提供整洁温馨的工作环境。但同居后，子君对涓生的照顾并非建立在“理解他”的基础上，而是忙于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不再有浪漫与激情，让涓生感受到爱的幻灭。并且锅碗瓢瓶、浆洗缝补的家庭琐事让子君的手变得粗糙，不再美丽。女性美貌的消失，使其丧失了作为“自由”“理想”象征的资格。

涓生“爱他就是懂得他，并照顾他”的家务观，投射出“五四”以来流行的新贤妻良母思想。“新贤妻良母”对女性的要求：一是尽全力建设自己小家庭，让“家”成为温馨美好的“心灵港湾”；二是关心国家大家庭，理解男性的理想抱负，能陪伴男性去从事翻译、教育、启蒙等社会事业。正如冰心《两个家庭》中的亚茜，她受过现代教育，能妥善地处理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务，深爱丈夫，孝敬老人，照料花草，对孩子施教有方，还教老妈子识字。做家务之余，亚茜还与丈夫“红袖添香对译书”。“亚茜所履行的多种主妇角色不仅包括负责私人领域的再生产，而且包括启蒙、翻译能够实现民族现代生活的现代化事业。”<sup>[42]</sup>由此可见，新贤妻良母既要承担新道德给予女性的社会责任，又要履行旧道德要求的侍奉家庭的义务。

新贤妻良母的形象，是“五四”以来诸多男性为逃避家庭劳动而鼓吹的女性形象。当现代爱情发展为现代家庭，也必然面临许多日常琐事与世俗人情。因此现代自由所致的现代家庭，必然强调男女双方在家务劳动上的平等。可涓生却推卸日常家务，时常说道：“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sup>[2](118)</sup>依据小说可知，涓生的业务能力稀松平常，“无法找到教读和抄写的工作机会，而倾其全力做的翻译，得到的认可程度很低，不过是价值五角钱的书券”<sup>[40]</sup>，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雇一个女工”，可他却不断宣称“雇一个女工”。“雇一个女工”的赘语仅是好听的“口号”，是涓生推脱家务的理由。涓生并无能力请女工，他并未怪自己的无能，反而将责任推卸给子君，向读者暗示是子君自愿承担家务而不愿请女工。由此巧妙地将家务责任转移给子君，并还带着好听的名声(我本愿请女工)来逃避家务。涓生不分担家务，还责怪忙于家务的子君“早已什么书也不看”<sup>[2](126)</sup>。这种责怪，不是指责子君做家务，责怪的是子君在做家务时却未能保持新女性的浪漫与优雅。

涓生对子君的指责，是当时“自由”之后男性的普遍心理。叶绍钧《倪焕之》中的倪焕之亦是如

此。在倪焕之眼里，结婚后的金佩璋从“嗜书如命”的进步女性沦为仅关心“柴米的价钱”的家庭主妇，其兴趣只在“一件新缝的小衣服”“一双睡莲花瓣儿那么大小的软底鞋”等琐事上。并且家中凌乱的破鱼肚、脏衣服、剩饭米，以及佩璋逐步消损的容颜与困疲的姿态，都令倪焕之厌恶。小说最后，倪焕之逃离家庭，而金佩璋忏悔了自己沉迷于家务的“堕落”，说道：“我要出去做点儿事；为自己，为社会，为家庭，我都应该做点儿事。我觉悟以前的不对，一生下孩子就躲在家里。”<sup>[43]</sup>小说以金佩璋的反省，强化了新女性不仅是“妻子”更是“同志”的逻辑。“妻子”加“同志”的模式，实则就是新贤妻良母主张之体现，这既要求女性处理好家务，又让女性能陪伴男性走入社会建设之中。

在子君与涓生的故事中，鲁迅展示了新贤妻良母主义对女性的压迫。日常家务的性别属性并非女性专属，应是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责任。同居后子君所从事的琐碎家务，展示了二人在家务劳动上的不对等。但此前的研究者并未意识到此种不平等，反而以沉迷家务来指责子君，或提出“这些日常琐屑与爱情应有的社会、民族追求向度差距巨大。涓生感到他们的精神距离愈来愈大。这是他们爱情走到尽头的主要原因”<sup>[44]</sup>，或认为“她的‘平庸’与琐碎是一种逃避，女人天性中对凡俗的喜好与沉浸使她于逃避中觅到了一种真正的乐趣，这是她危机的开始”<sup>[45]</sup>，或指出“爱情是以双方各自的同步发展和交流为基础的，子君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她整天忙于管家务、饲油鸡、喂阿随，而忘却了与涓生的交流”<sup>[46]</sup>。这些研究是站在新贤妻良母的立场来苛责子君，潜在地将“家务劳动”等同于“平庸”“落后”。

“五四”以来，女性逐步地接受教育，渐渐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当女性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时，家务仍需由女性全部承担吗？庐隐的《补袜子》就进行了思考。在《补袜子》中，夫妻双方皆有各自的事业，可丈夫的袜子破了，没人补，他抱怨妻子不会管家。小说中的丈夫对妻子的要求是：“我觉得补袜子的太太也很需要的呢！譬如炒炒小菜呀，管管仆人呀，家里弄得清清爽爽多少舒服呢！”可妻子和丈夫同样在外面教书，下班回来对那些琐事已无精力，所以妻子会说：“天下事很难两全，你若要我送你两双新袜子到好办，如果要我替你补袜子那就办不到了。”<sup>[47](685)</sup>这可窥出，当时男性希望女性兼具“补袜子的太太”与“经济独立的太太”于一身。

负责所有家务劳动并兼具社会责任的女性最终只是负重的骆驼。《伤逝》中的子君如有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她与涓生就能幸福永远吗？当下研究者多用经济问题来弱化二人间的家务问题。二人如没有经济重压，子君会不会如《倪焕之》中的金佩璋一样自愿去承担新贤妻良母的双重重担？承担了贤妻良母双重重担的子君，会获得幸福吗？在“五四”时鼓吹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冰心，后来也发现此种理念对女性的伤害。在冰心《我的学生》中，S女士是完美的新贤妻良母，她既把家经营成“澳洲公使馆”；又在小学兼职，“一个人做着六七人的事”，似乎能应付自如，可处处求全的S女士最终因操劳过度而去世<sup>[48]</sup>。由此推论，如果没有经济危机，等待子君的仍是死亡。小说现在的结局是，子君因经济危机的促使下而被涓生抛弃，最后抑郁而亡。可依据涓生对子君的期待来推测，子君与涓生就算没有经济的压力，子君也会因承担新贤妻良母的重任而活活累死。

由《伤逝》也可窥出鲁迅“立人”思想的完整性。鲁迅所强调的“立人”，不仅是“人”在经济、精神等方面的主体性，也应包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因此在他看来，自由恋爱、婚姻的成立需有三大要素：一是经济平等，男女双方皆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二是精神平等，男女双方有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三是家务平等，男女双方要共同承担日常生活琐事。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在鲁迅《伤逝》之后，庐隐、凌叔华、白薇等女性作家用各自切实的女性体验来表明，在实现经济平等、精神平等的前提下，家务平等也是自由恋爱、婚姻成立的关键性元素，否则所谓的自由爱情“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sup>[49]</sup>。此种困境延续至今。当下男女在经济、精神上已达到相应的平等，可家务问题却成为现代恋爱、婚姻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 四、结语

对鲁迅《伤逝》的理解需纳入清末至“五四”的语境中。《伤逝》警惕“罗兰夫人”“娜拉”等形象背后“自由”遮蔽“平等”的现象,反思“五四”爱情定则是以强者的喜乐为标准,批判新贤妻良母主义中的性别不平等。由《伤逝》可知鲁迅“立人”思想的复杂性与完整性,表明“人”不仅应具有“人各有己”与“反诸己”的相互主体性,也应打破在经济、精神、日常家务上对“他人”的依附性。作为思想史文本的《伤逝》是近现代女性主义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对当下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与思想解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 注释:

- ① 相关解读详见蓝棣之《“万不可做将来的梦”——论〈伤逝〉》(《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10期)、刘俊《对“启蒙者”的反思和除魅——鲁迅〈伤逝〉新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杨联芬《叙述的修辞性与鲁迅的女性观——以〈伤逝〉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3期)等文。
- ② 相关解读详见金理《造人·“伪士”·日常生活——重读〈伤逝〉,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李今《析〈伤逝〉的反讽性质》(《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杨剑龙《男性视阈中的女性关照——读鲁迅的〈伤逝〉、叶圣陶的〈倪焕之〉》(《南开学报》2005年第5期)等文。
- ③ 相关解读详见刘彬《〈伤逝〉与“兄弟恩情的断绝”》(《鲁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3期)、商昌宝《为何说〈伤逝〉是哀悼兄弟恩情的小说》(《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等文。
- ④ 原载《东西南北》,《民立报》1911年4月17日第6版。转引自黄湘金《小说内外:清末民初新女性“自由结婚”观念的发生》(《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
- ⑤ 原载定原:《女子复权论》,《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年5月第1期。转引自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 参考文献:

- [1] 茅盾. 茅盾全集: 中国文论二集[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
- [2] 鲁迅. 鲁迅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 梁启超. 梁启超评历史人物合集: 西方卷[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 181.
- [4] 大谟. 女界警词[J]. 河南, 1908(8): 95-96.
- [5] 竞群. 春闺杂咏五首[J]. 中国新女界杂志, 1907(2): 108-109.
- [6] 张肇桐. 自由结婚[M]//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女媧石等.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85: 114-115.
- [7] 何震. 震致留日女学生书[M]// 万仕图, 刘禾, 校注. 天义·衡报.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547-548.
- [8] 何震. 女子宣布书[M]// 万仕图, 刘禾, 校注. 天义·衡报.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41-43.
- [9] 幸德秋水. 幸德秋水来函[M]// 万仕图, 刘禾, 校注. 天义·衡报.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347.
- [10] 何震. 幸德秋水来函·震附志[M]// 万仕图, 刘禾, 校注. 天义·衡报.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347.
- [11] 凯特·米利特. 性政治[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33.
- [12] 何震. 女子解放问题[M]// 万仕图, 刘禾, 校注. 天义·衡报.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38.
- [13] Y. D. 自由恋爱与恋爱自由[J]. 妇女杂志, 1923, 9(2): 41-43.
- [14] 漱琴. 我之理想的配偶[J]. 妇女杂志, 1923, 9(11): 66-68.
- [15] 章锡琛. 关于恋爱问题的讨论[J]. 妇女杂志, 1922, 8(10): 120-121.
- [16] 茅盾. 茅盾全集: 散文五集[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

- [17]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8] 鲁迅. 鲁迅全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9] 何震. 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M]// 万仕图, 刘禾, 校注. 天义·衡报.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204.
- [20] 苏青. 谈婚姻及其它[J]. 天地, 1945(18): 15-17.
- [21] 毕新伟. 爱与善的两难——论《伤逝》[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0(2): 105-114.
- [22] 田汉. 秘密恋爱与公开恋爱[J]. 少年中国, 1919, 1(2): 33-35.
- [23] 张崧年. 男女问题[M]// 孙郁. 新文化运动史料从编(妇女与性别卷上).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149-153.
- [24] 李三无. 自由离婚论[M]// 孙郁. 新文化运动史料从编(妇女与性别卷上).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394.
- [25] 谢世豪. 读东荪《妇女问题杂评》的意见[M]// 孙郁. 新文化运动史料从编(妇女与性别卷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22.
- [26] 张竞生. 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M]// 张培忠. 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37-38.
- [27] 冯士造. 爱是抽象和神秘的感情[M]// 张培忠. 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64.
- [28] 丁勒生. 爱情就是爱情[M]// 张培忠. 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70.
- [29] 谭树榭. 物之浊清起于心之浊清[M]// 张培忠. 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121.
- [30] 世良. 爱情定则只适用未订婚之前[M]// 张培忠. 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53.
- [31] 裴锡豫. 有条件的爱情是假爱情[M]// 张培忠. 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136.
- [32] 钟孟公. 不要再胡乱登载下去了[M]// 张培忠. 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149.
- [33]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4] 钱谷融. 谈《伤逝》[J]. 鲁迅研究月刊, 1991(6): 39-42.
- [35] 汪丽玲. 婚事[J]. 大众(上海), 1944(19): 87-90.
- [36] 黄亚中. 恋爱的悲剧[J]. 妇女杂志, 1923, 9(12): 37-41.
- [37] 刘维坤. 黄女士的自述[J]. 妇女杂志, 1924, 10(2): 368-370.
- [38] 李相杰. 离婚之标准: 爱情和人道[J]. 妇女杂志, 1922, 8(4): 185-187.
- [39] 李美容. 从浪漫的质疑到自我的否定: 鲁迅对启蒙的反思[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165-169.
- [40] 朱国华. 另类的思想实验: 重读《伤逝》[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2): 139-155.
- [41] 鲁迅. 鲁迅全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42] 任佑卿. 现代家庭的设计与女性/民族的发现: 从冰心《两个家庭》的悖论说起[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8(3): 56-67.
- [43] 叶圣陶. 倪焕之[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287.
- [44] 徐仲佳. 叙事视角与召唤结构: 《伤逝》意蕴再探讨[J]. 文学评论, 2020(1): 148-156.
- [45] 冯金红. 忏悔的“迷宫”——对《伤逝》中涓生形象的分析[J]. 鲁迅研究月刊, 1994(5): 21-25.
- [46] 秦林芳. 现实的冲突与生命的焦虑——《伤逝》意蕴新探[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1): 108-114.
- [47] 庐隐. 庐隐小说全集[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7.
- [48] 冰心. 关于女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117.
- [49] 程俊英. 回忆庐隐二三事[M]// 朱杰人, 戴从喜. 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11.

## E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 The novel *Regret for the Past* as a text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WANG Xiaohu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heated pursuit of the free image of Lady Roland by wom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imitation of the image of Nora by women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t can be seen that women's enlightenment ideas have entered a mindset of "freedom" suppressing "equality"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Lu Xun's novel *Regret for the Past* continues He Zhen's reflection on gender equal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riticizing the phenomenon of "freedom" obscuring "equality"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opposing the enlightenment approach of transforming "gender power issues" into "new and old hierarchical issues". Moreover, Lu Xun's reflection on the frequent reminiscing of love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Regret for the Past* denies the view of love freedom based on the preferences of the strong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criticizes the destructive real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thinking of "freedom" suppressing "e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Regret for the Pas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equality in housework" in free love and marriage, proposes that the gender nature of daily housework does not exclusively belong to women, and emphasizes that "equality in housework" is as important as "economic equality" and "spiritual equality". In short, *Regret for the Past* is one of the signs of the maturity of modern feminist thought.

**Key words:** freedom; equality; the changes of love; housework

[编辑: 陈一奔]

---

(上接第 86 页)

## The opportunity for young Engels to investigate national economics and its inspirations

JIANG Haibo

(School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econom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Marxist theory, and one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Marx and Engels to constru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fully explained the opportunity and significance of Engels' first study of national economics. Based on reviewing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taking *The Outline of the Criticism of National Economics* as the research focus, this article, by analyzing the young Engels' study, business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clarifies that Engels has drawn inspirations of integrating German philosophy, French socialist thoughts and national economics from the works by socialist Ricardo. Only by experiencing the opportunity to solve the British social problems, did Engels have to temporarily give up the unique German way of thinking, turn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instead,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n discover the fundamental force to promot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Key words:** Engels; national economics; Ricardo's soc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编辑: 胡兴华]